

東歐

探索



東歐探家

——五次旅行東歐的觀察和思考

溫輝

百家出版社出版

東歐探索

——五次旅行東歐的觀察和思考

溫輝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香港軒尼詩道郵箱 20370

大華印刷廠承印

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

兆孚工業大廈一、二樓

一九八八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H. K. \$40.00

目 錄

代序 (一)

一個較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十七)

簽證·檢查·虛驚——進出自由，來往自由——橫衝直撞拍陰暗面——兩個時代

低分數的民主自由 (二八)

裸泳與社會主義——一個歷史的誤會——獨特的自治制度——理論·現實·差距——女「吉拉斯」談吉拉斯

刺激罷工的書和罷工自由——一個有趣的故事——「家庭旅社」的寶貝——大膽的政治漫畫

從廚房看一個國家 (四八)

帶着廚房哲學入古城——在普通一家登堂入廚——敗絮
其外，金玉其中——百貨公司的特別貨品——在血泊和
汗水中站起來——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自由市場裏

的「迷失」——獨特的南斯拉夫模式——兩副眼鏡——
個錯誤

橫圖白色的城 (六五)

第一印象：是不是廣州？——彩色繽紛：滿街「新娘子」

——繁華漂亮：舊城與新城——社會細胞：地方共同體

——園林餐廳與「大廚房」——尋找乞丐的蹤影——公
園裏的可憐人——赤貧人，你在哪兒？——幾十萬人外
流西歐——趕快離開那個車站吧！

奇異的精神世界 (八〇)

冷面孔——第一個笑臉——人類愛——裸體文化與性開
放——非禮犯罪率何故低——「共」與「非共」——舞
台上的「非共」戲——「功夫！功夫！」——需要探討的

問題

在匈牙利的門檻外 (九八)

從捷克去匈牙利——東德邊境上的無妄之災——兩次進入戒備森嚴的東柏林——使我驚異的羅馬尼亞老漢——捷克婦人的一席話——這裏是巴黎嗎？

東歐的巴黎——布達佩斯 (一一四)

雄偉壯美的城市——「乞丐王國」——沒有購物長龍的國家——滿街維納斯——富人村與平民屋——九個人一部小汽車——非「社會主義夜色」——這是一本大書
匈牙利在走資嗎？ (一二八)

現代派的詩——黑市反映走資？——「社會主義廁所」——「一包就靈」——可僱工三十人——合同小組和合作社——最大的承包：合同廠——個人的「第二職業」——對「小承包」的爭論——小商店老板娘的訴苦——爲什麼「放放收收」？——歷史的問卷

靜悄悄的革命 (一四四)

中匈道路的異同——改革貫串着鬥爭——改革帶來了生機——糧食出口與「海鮮」——農業小生產令人矚目——兩個叫人驚訝的數字——「萬元戶」與私人建房——「你可以買一座山」——值得思考的問題

框框裏的自由 (一五八)

馬克思的觀點受到挑戰——匈牙利作家出書要過什麼關——私人辦刊與地下刊物——匈牙利不抓「魏京生」——舞台劇的啟示——自由的局限和放寬

匈式民主 (一七一)

裴多菲的祖國——執政者的民主作風——「向前慢進」的民主化——傳統的選舉框框未突破——《人民監督法》與義務監督員——斯大林政治模式的變化——從「非友

即敵」到「非敵即友」

浪濤之都 (一八二)

的士「遊河」——彩票熱——「磨洋工」——古典音樂
與流行曲——浪漫感——電影中的女「流氓」——要同
居不要結婚——兩類型心態

這才是成功的改革 (一九三)

超階段和超現實的社會主義——三種體制改革模式的比
較——什麼模式比較好？——南匈兩國改革取得成績的
因素——缺點、困難、問題——「共產國家」一個通病
——成功的改革是徹底的改革——法共一句話值得中共
深思

重訪匈京 (二〇九)

改革的足印——像三藩市還是更像巴黎？——橫衝直撞
「中南海」

裸照與兩性關係 (二一五)

改革、開放的產物——人性爆炸的反映——這裏不搞「
清污」運動——兩性關係的新模式——離婚率上升是道
德倒退嗎？——願仙鶴長留他們身旁

可喜的與可憂的 (二二三)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是天堂，也不是乞丐王國
——為什麼不「走資」？——匈式社會主義一系列問題
——學習匈牙利·超越匈牙利

三進匈京所思考的 (二三四)

是不是「虛假繁榮」？——乞丐和債務絞索——「一場
三制」——國營企業的一個通病——小毛病與致命傷
——西方還私法與東方肢解術——波蘭經驗與匈牙利新
措施——突尼斯模式優於匈牙利模式

匈牙利狂想曲 (二四八)

——三訪布達佩斯
匈牙利會變成東歐奧地利嗎？——自由的孔雀和籠裏的

孔雀——他為什麼不願意會晤香港來客？——為納吉辯護的詩人受批評——政治開放的局限性——大烏籠比小烏籠——比「四個堅持」高明的「一個堅持」

匈牙利的另一面（二六七）

——第五次旅行東歐的沉思

尋人：當年的北大「校花」——布達佩斯的笑容少了

——大量昂貴的西紅柿爛在地上——「差遠呢！」——

和三位漢學家的交談

柏林牆東（二七九）

兩個獨裁者——偉大的謊話——比匈牙利落後十年以上

——自由！自由！圍牆內的呼喚——我的祝福，向北方，向遠方……

關於波蘭局勢的對話（二八九）·附錄1·

對立的三角與妥協——為什麼對軍事政變毫無準備——

為什麼總罷工這個武器會失效——怎樣估計波蘭局勢的發展——團結工會內部三種意見——團結工會領袖們並不悲觀

同捷克流亡作家的晤談（三〇二）·附錄2·

東歐國家與霸權主義——對匈牙利事件和納吉的評價

——蘇聯對外擴張的動機——捷克人民會造反嗎——東歐人民要求什麼制度

「法式社會主義」的實驗（三一四）·附錄3·

巴黎，一樹綠葉——一串動人的數字——令人驚奇的農村圖景——「自由、平等、博愛」——「第三條道路」的試驗——奇蹟會出現嗎？——法國的改革風——改革

之改革——「不能說是社會主義」——集體化國有化不等於社會主義——中蘇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法國的經濟體制基本未變——官僚化的問題能解決嗎？——一個

阻力：法共——知識分子走在工人階級前頭

「共產世界」能找到出路嗎

代序

東歐是一本書。東歐是一扇窗。爲了從這本關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書中了解改革的狀況，爲了從這口窗展望着在改革道路上起步較晚的中國的前景，我在一九八二年到八六年這五年間，五次到東歐旅行、觀察和訪問一些普通人家、學者教授。由於客觀和主觀條件的限制，我對這本書讀得不夠，理解得不深。窗口外望，「能見度」也有局限性。不過對東歐七國（匈、南、捷、波、保、羅、東德）的表層探索以及這些年來旅行歐美亞發達國家的所見所聞，確實觸發了我對於一系列問題的沉思。經過幾年的反覆思考，我對「共產世界」一些根本性質的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把這些看法、特別是關於困境中的「共產國家」能否找到出路這一問題的看法提出來，一是爲了引發具有共同旨趣的朋友對問題進行共同探索，二是爲了自己在共同探索中吸取教益。

「共產世界」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存在着或輕或重或潛在或表面化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精神危機。中共是諱言危機的。一些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却公開承認這是現實。

經濟危機是由於生產關係極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而引起的。生產效益奇差、勞動生產率低下、出口貿易不振（或外貿逆差）、外債負擔沉重、外匯儲備下降、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不已、物價高漲持續、日用品供應不足、農業生產出現危機、人民生活改善緩慢等等，大都是「共產國家」的經濟通病。經濟生活比其他「共產國家」略為安穩的匈牙利，近兩年的困難也是嚴重的。匈共總書記卡達爾不久前在國會直言不諱，並強調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政治危機主要是人民和統治集團、官僚階層矛盾的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東歐「共產國家」不少人由於生活困難或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得不到滿足，由於對統治集團、官僚階層的極權主義、特權主義、不正之風十分不滿，因此都要求實現民主政治，以權力制約權力。這裏不必說三十年前發生在波茲南和布達佩斯的事件，就以最近幾年的情況看，東歐的民主運動也是此伏彼起的。八十年代初期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震動了整個「共產世界」，直到目前，運動的火焰還在燃燒。一九八七年南斯拉夫四家黨報的四名記者，發起「團結基金會」運動，要求南共下台，實行多黨制，在社會上得到有力

的支持，使南共和「共產世界」震驚不已。今年三月十五日，匈牙利首都發生了一萬多人參加的爭取自由和徹底改革的大示威。這也是一次舉世矚目的爆發。匈共內部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多年來也一直存在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近年還出現另一種鬥爭，就是黨內一股要求實行西方民主的勢力冒頭來，並提出建立多黨制的主張。這種「不同政見」受到壓制。匈共中央書記霍爾瓦特就在《社會評論》中予以公開批判。羅馬尼亞的經濟危機——能源短缺、出口生產減少、經濟基本效率低下，材料消耗增加等等——也導致一場政壇風波，一批高官在吵鬧聲中被攆出內閣。

和經濟危機、政治危機連在一起的，是精神危機。所謂精神危機，就是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和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或曰三信危機。在中國，三信危機在文革中才嚴重化起來。而在東歐，由於東歐人民具有更高度的政治敏感，他們早就察覺到共產黨的一套——包括蘇式社會主義制度不對頭，因此，三信危機在五十年代就已經出現，而且一再爆發。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團結工會事件和最近一兩年興起的新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反映了離心傾向的異常嚴重。不過現在許多東歐人、中國人的精神狀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政治冷感症的表面化。他們不喜歡談論什麼主義，而只是關心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和生活。向錢看的觀念不是中國的土特

產，而是所有「共產國家」社會心理的主流。這也是三信危機的強烈折射。「共產世界」多種危機的產生，原因是複雜的。這個國家的因子和那個國家的因子也不盡相同，但是有一個根本原因是共通的，就是一切「正統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都不是歷史的分曉，而是歷史的早產。

在整個「共產世界」中，原來具有現代資本主義水平的，只有捷克一國，其他原都是以農業爲主的、經濟落後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捷克），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因此只能讓客觀規律的紐帶，送進發展以私有制爲主體的自由經濟和建立多元化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階段。第二國際的優秀理論家們早就提出，要「把一定水平的資本主義發展當作普遍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並且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裏巨額財富，社會主義，即在現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會成爲可能」（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那些左傾機會主義的革命家，却充當了最蹩腳的助產婆角色，使用暴力把未成熟的胎兒從母體中強擠出來。在東歐，和在中國一樣，到處都可以發現歷史早產兒的孱弱和殘缺現象。一些共產黨人，經過長時間的沉思、反思已經察覺到革命是從條件產生，而不能被製造

出來。人工催生的歷史產物，發育不會是正常的。其實，東歐（和中國等）的現狀充分證明，不僅一九七六年的東歐（和中國等），沒有登上社會主義的初階，而且直到今天，和馬克思主義所規範的社會主義還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馬克思主義初級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但是「共產國家」的勞動人民，都感受到自己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官僚階層的貪污舞弊、壓價收購、以權謀私、揮霍公帑——極大浪費人民血汗，這是不是剝削？搞政治運動，鎮壓民主運動和持不同政見者，這是不是壓迫？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爭得民主。」（《馬恩全集》第四卷第五〇四頁《共產黨宣言》）列寧更具體地說：「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要民主百萬倍」（《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三〇頁《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斯大林也具體地說：蘇聯的政治生活已經「完全民主化」，「誰也不敢否認我們（蘇聯）的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五二頁）。我想誰都不敢說「蘇聯的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但是誰都敢說蘇聯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國家之一。這是事實，蘇聯和一切「共產國家」的人民，幾十年來都沒有享受過一點兒民主。近年來「共產國家」搞差額選舉，而且吹噓這是民主的體現，但人們知道，這不過是政治遊戲，是維護一黨專政、大權獨攬的一種手法，

和巴黎公社普選原則大相逕庭。西共領袖卡里略承認，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不能算作是工人民主國家」，「如果說各國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多表面的東西的話，到目前為止，共產黨人所達到的工人階級民主也是這樣。」（〈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事實上，所謂「工人階級民主」不僅遠遠沒有達到「資產階級民主」的水平，而且只是獨裁政治的另一名稱。情況正如第二國際代表人物奧·鮑威爾對蘇聯政治的實質所分析的一樣：共產黨政權「只是在思想上代表無產階級，但在實際上，它不再是僅僅對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實行獨裁統治，而且也對無產階級羣衆本身實行獨裁統治」（〈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列寧又說過，無產階級政權下的勞動生產率是最高的。列寧主義者還說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優越性，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但事實却是，「共產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西方國家。僅僅從「工人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勞動生產率」兩個視角看，就可以肯定，一系列的歷史早產兒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規範的社會主義，更不是瑞典式的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

歷史早產兒的「後遺症」是很多而且是很嚴重、很難醫治的。在「共產世界」中，無論是東歐社會還是東亞社會，有一個矛盾是特別突出的，就是

共產黨或共產黨政權和人民之間的矛盾。

產生矛盾的原因不止一個，但根源的根源却只有一個，就是這些國家經濟、政治、文化、意識等方面原來的落後性或不發達性。

●由於國家原來不發達，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於是就急於建立生產資料的國有制、公有制，同時採取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這是爲了儘快實現工業化，爲了強化共產黨政權，爲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爲了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強化軍力。但是實現公有化和工業化，必須以勞動人民無窮無盡的犧牲——包括工人的廉價勞動力和對農民生產物的壓價收購等等——作爲代價，而這是勞動人民所不能長期忍受的。這樣，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就產生了矛盾。

●由於國家原來不發達，小農經濟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特別大，一般農民和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工人，都有強烈的小農意識，而恰恰欠缺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念。蘇聯、東歐、中國在革命中所提的主要口號，無非是「自由、麵包」之類，極少出現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語言，這種低調的宣傳策略，就折射出廣大人民缺乏社會主義意識。一些共產黨往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人心所向，這是一種虛偽宣傳，有如賣假藥的廣告。事實上農民對集體化政策也不歡迎，甚至抗拒。鮑威爾說得對：即使有積極性的貧農，心中

想的也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爲了重新分配土地和農具，這些貧農「並不比有財產的農民更接近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這是勞動人民對經濟負擔和剝削的承受力很有限度的原因。長期超負荷必然導致情緒上的抗拒甚至行動上的反抗。

● 由於國家原來不發達，蓋在貧弱的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陳腐性、封建性，規限着多數共產黨人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思維，却有着過多的救世主義和統治者觀念，這樣，他們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滾進了以權謀私的特權主義的泥淖，同時對懷有抗拒情緒的人民進行「專政」。用一位理論家的話說，就是「一個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集團，在同人民相對抗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少數人的集團不得不用武力和恐怖來壓制人民大多數。」——它廢除了普選制、新聞出版自由，剝奪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權利，以專政代替了民主。於是，那些本來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的人們被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敵人，爲謀求自由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們，也被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

這些話說的是十月革命後俄國的情況。但七十年過去了，蘇聯還不是這個樣子？更使人感慨萬千的是，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東歐國家，出現在中國，而且不僅僅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還是現實。說這話的理論家是被列寧扣上「叛徒」帽子的考茨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五十多年後，卡里略不

避「叛徒」之嫌，說出類似的意見：爲了迫使人民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共產黨政權「不僅鎮壓舊的統治階級，而且也鎮壓一部分人民（確實是人數不少）」，「大部分居民是被動的，很大一部分又是持敵對態度的。工人民主逐漸縮小了，黨內民主也縮小了，社會上的尖銳矛盾反映爲黨內派別鬥爭的加劇。」（〈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

● 由於國家不發達，內外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共產黨人爲了逃避不安全因素，爲了加強統治、鞏固政權，就要求採取反經濟民主、反政治民主的集權手段，去進行經濟管理和政治箝制。這就是當年列寧曾經設想延長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無須利用多種經濟形式和市場、商品、貨幣）的動機，也是蘇共後來被迫實行和「戰時共產主義」大相逕庭並頗有成效的新經濟政策（容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利用市場、商品、貨幣）才十幾年就提前結束（列寧原計劃是至少實行二十五年），急不及待地宣佈對資本主義全面進攻，強令全國實行集體化、改造小農、消滅富農階級、建立高級農業公社的原因，同時也是斯大林經濟模式、政治模式產生、延續、並能在其他「共產國家」的土地上繁殖的根本因素。斯大林模式助長了這些國家的官僚國家主義化，這個體制和馬克思主義所規範的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正如南斯拉夫理論家P·弗蘭尼茨基所說的，「由於工人階級

（統治者）的異化的存在，這些體制（國家社會主義、官僚國家主義）通過強化集權的和壟斷的特權，可能轉變為比許多資本主義體制更糟的可怕的怪物。」（《社會主義革命意味着什麼？》）

● 由於國家不發達，文化科學技術教育處於低水平狀態，工業組織和管理的能力相應薄弱，生產關係約束着生產力的發展，雖然國家工業化不無成就，但是總體來看，經濟效益甚差，經濟危機逐漸形成，於是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加深了，社會離心傾向——三信危機更加嚴重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加劇了……這是循環的危機和危機的循環。東歐國家一直在這個谷底的圈子中打滾，蘇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軌跡也大致如是。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確定，在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是完全違背歷史軌道的反邏輯的唯意志論的錯誤行動。東歐和其他「共產國家」所以至今還在重重危機的困境中難以解脫，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超歷史階段和歷史對超階段的報復。也許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些意思：

超階段是萬禍之源。

這個結論並不是很新鮮的。波蘭科學院院士、前波蘭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亞當·沙士在分析一九八〇年興起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時，就得出結論說：「企圖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的國家裏建立社